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俄】B.C. 米亚斯尼科夫 主编 徐昌翰 等译 徐昌翰 薛衍天 审校

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 第1卷 1803~1807（上）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IX ВЕКЕ
Том 1
1803 * 1807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俄】B. C. 米亚斯尼科夫 主编 徐昌翰 等译 徐昌翰 薛衍天 审校

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
第1卷 1803~1805年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IX ВЕКЕ
Том 1
1803 * 1805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Данный том подготовлен при содейств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онда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М.Б. Давыдова, И.Т. Мороз, В.С. Мясников,
Н.Ю. Новгородска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акад. С.Л. Тихвинский

Редактор тома

В.С. Мясников

Сборник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первый том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й сери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IX в." Данная публикация впервые делает доступным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комплекс материалов, связанных с посольством Ю.А. Головкина в Цинскую империю (1803–1807). Публикуем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освещают вопросы подготовки посольства, поездки в Пекин 9-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а такж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посла на границе и в Урге.

Р 0503010000 – 020
01Д(03) – 95 Без объявления

ISBN 5-88451-029-2 Том 1
ISBN 5-88451-032-2

© Давыдова М.Б., Мороз И.Т., Мясников В.С.,
Новгородская Н.Ю., составление, 1995
© Мороз И.Т.,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введение,
приложения, комментарии, указатели, 1995
© Мясников В.С.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введение,
комментарии, 1995
©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 1995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

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

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年5月

中译者前言

戈洛夫金使团不果而返的出使中国，过去已经整整 200 年了。现在回头再看，依然有许多值得探讨、回味和思考的内容。遗憾的是历史学家们，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对它的了解却是那么少。

200 年前，即 1805 年的 12 月 25 日，隆隆礼炮和阵阵排枪打破了蒙古荒原的寂静。一支蜿蜒数公里的队伍冒着零下 30 度的严寒，离开俄国边境要塞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经由恰克图踏上了南下的旅程。送行的队伍威武雄壮。走在最前面的是 200 名马刀闪亮的哥萨克骑兵，一面面绣着双头鹰的军旗在寒风中抖动。后面是又一队人高马大、盔甲鲜亮的龙骑兵。走在两队之间的则是这个场面的主角——俄罗斯国出使中国的特命全权使臣戈洛夫金伯爵。这一天他没有像由圣彼得堡一路上过来惯常的那样乘坐轿马车，而是特意骑了一匹鞍辔鲜亮的骏马，身着锦绣华服，肩披绶带，一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样子，似乎对几经周折后即将展现在面前的出使光明前景充满了希望。龙骑兵的后面，跟随着百十辆各式各样的马车：有豪华轿马车、普通篷马车、朴素的斗子车，也有临时征集来的蒙古草原常见的勒勒车……它们都是使团随员的旅行工具，标志着各自主人身份的高下尊卑。由于经历了由圣彼得堡到恰克图横穿欧亚大陆长途跋涉的洗礼，车身早已伤痕累累，装饰破旧，丧失了几个月前的辉煌和光鲜。跟随大使出使中国的数十名使团成员——骑士、宫

廷低级侍从、使团侍从、军官、学者……众多达官显贵以及他们的跟随、侍仆和马夫，都怀着兴奋好奇的心情在马车上东张西望。迤迤的驼马辎重粮草在身后的荒原上爬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蛇。这支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队伍，吸引了沿途牧民好奇的眼光……这就是当年使团从恰克图出发的大致图景。

戈洛夫金使团，从俄国方面看，可以说是清代中俄关系史上最为重大的一次外交出使行动，它的主要策划者和推动者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时任商务大臣后任总理大臣的鲁米扬采夫，而他背后的支持者则是登基时间不长但雄心勃勃好大喜功的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本人。俄国政府对这次出使活动抱有很大希望，认为是一次开拓国际市场、满足国内日渐发展的经济需求、从中国争取最大利益的行动，也是一次联合中国平衡亚洲政治势力、对抗英美势力日渐扩张的重大措施。对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影响可能十分深远的行动，俄国政府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它经过长期筹划准备，除了制定目标远大措施周密的出使训令、备办了形形色色用心良苦寓意深刻的礼品之外，就连统一使团成员的制服、制作专用的使团宴客餐具、成立吹奏乐队等细节都考虑进去了。赋予使团的任务是宏大的，其中包括在新疆地区开辟布赫塔尔玛通商口岸、取得黑龙江自由通航权、开辟广州贸易、在我国内地商业中心城市设立代表处、加强中俄关系对抗英美商业竞争；重提在《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也称《恰克图条约》中遗留的未能划定边界的“乌第河地区”的边界勘分问题，争取以黑龙江为界划定边界；通过中国内地开辟通向我国西藏地区乃至通向印度和阿富汗的商路等等。

为了完成这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谈判，亚历山大一世

在考虑了多名人选之后，最终把目光落到了圣彼得堡上层权贵圈子里素享睿智之名的政治家尤·亚·戈洛夫金身上，决定由他出任出使中国的特命全权使臣。这件事成了1803~1805年圣彼得堡贵族沙龙的热门话题。最后的安排凸显了使团的重要性和对它寄予的厚望。使团的规格之高是少有的。戈洛夫金伯爵出身俄国最显贵的名门望族，身居二等文官^①，就任大使后又被任命为西伯利亚各省总巡按，具有代天子巡狩的钦差大臣的身份，甚至有权不经奏报直接任命公使衔的外交代表。

戈洛夫金使团先是一路跋涉，穿越西伯利亚，于1805年的9月份抵达伊尔库茨克，并同清政府展开了积极的交涉。经过压缩使团人数、外交使团同换届的教士团分开走等种种周折，等待了3个月之后，终于在1805年临近岁末的时候走出了国门，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俄国使团顶风冒寒一路行来，于新年的第二天即1806年1月2日抵达库伦。随着，清俄双方又发生了礼仪之争：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奉嘉庆皇帝的圣旨，在当地为大使赐宴，要求戈洛夫金对着皇帝的牌位谢恩，行三跪九叩礼。这个在中国官员看来是天经地义的要求被俄罗斯使臣断然拒绝。双方围绕此事展开交涉，库伦北京600里快马函札交驰，库伦办事大臣府邸内中俄官员唇枪舌剑。经过整整一个月的拉锯，库伦当局甚至还使用了一些断粮断薪的极端手段，最后嘉庆皇帝一锤定音：遣返不懂规矩的俄国使团。1806年2月1日，库伦办事大臣下了逐客令。俄国使团一路忍饥挨饿、冻馁交加，在清政府官员的护送下原途狼狈而返。一路上溃不成军，队伍搞得七

^① 在俄国整个文官制度史上，具有一等文官等级的一共只有三四人，他们必须是总理大臣。

零八落。当戈洛夫金最后把自己的部下集合起来时，不得不感叹好在还没有人魂断异国他乡。2 月 11 日这支队伍终于又回到恰克图，同出发时的情景形成强烈对照。

一个背负着各种政治诉求和经济诉求的辉煌的使团，经过充分准备，怀着志在必得之心，不远万里踏上了大清国土地。不料滞留了一个半月之后，连库伦也没有走出去，便戏剧性地“铩羽”而归。其间的是非得失成败因果等等，还是留待历史学家们去评说罢。但有一点，窃以为特别值得一提，就是戈洛夫金使团不仅带来了体现本国、本民族政治、外交、商贸、领土等诸方面利益诉求的出使计划，而且也给正在从康雍乾盛世一步步走向衰微的中国带来了一股文化上的、观念形态上的乃至心理上的冲击。有意思的是这场冲击并没有直接涉及两国之间的领土、战争、通航、贸易之类的具体权益问题，但却通过礼仪之争和处理危机的过程，清楚地表现在文化理念、外交理念、主权理念、战争理念、决策理念、世界权力结构理念等许许多多“非物质”的问题上。冲突的代表人物，从俄方来看，是具有纯粹西欧文化背景的戈洛夫金；从中方来看，则是嘉庆皇帝和他在库伦的代理人蕴端多尔济。双方文化上的、心理上的和性格上的差异无疑能引起今日研究者莫大的兴趣。当然，这种冲撞由于只是发生在库伦，未能深入到帝国的心脏地区，因而影响比较有限，但即使如此，对于我们的历史学家也好，普通读者也罢，这场发生在国力于彼得大帝去世后 80 年间得到迅猛提升的俄罗斯同迅速走向式微的中国这个老大封建帝国之间的冲突，无疑能够为历史文化思考提供大量有趣的、内容独特的、生动的素材。

以 B. C. 米亚斯尼科夫院士为首的俄罗斯同行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从散藏在中国、俄罗斯和蒙古等地的浩如烟海

的档案文献中，筛选、整理、翻译出一百六七十万字资料，对之作周到的科学处理，把这次鲜为人知的重要的出使活动完整地、科学地呈献于历史学家们和广大读者的面前。B. C. 米亚斯尼科夫为本卷撰写的前言，指出了本文件集填补中俄关系史研究空白的重要意义，M. Б. 达维多娃则在本卷的《古文献学引言》中，把本书的编选情况和技术处理原则作了专门的详细说明，这些工作都将对准确理解和使用书中文献起到重要作用。编者们的广阔的科学视野和深湛的学术水平，以及处理历史文献的严谨态度，使这部篇幅巨大的文献资料著作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品质。

本书选取的内容，包括 536 篇档案文献、当时一位著名回忆录作家维格尔的关于出使活动的长篇回忆录、戈洛夫金的传记材料以及其他多种相关资料。它们全部是产生于当时的公文、信函、命令、训令、圣旨、计划、方略之类的东西，以及账单、物件清单、花名册之类原始单据性质的文献，其可靠性和研究价值是不言自明的。在相关文件和资料的注释中，又含有许多独立成篇的有的甚至篇幅巨大、相当翔实的背景资料，往往引自同时代人的相关论述和回忆，数量众多，弥足珍贵。所有这些文献资料不仅对于研究戈洛夫金的出使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了解更广泛意义的中俄关系、俄中两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两国某些地区的发展状况，乃至当时的国际关系格局、边疆民族关系等等，都能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出使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同欧美列强在商业贸易和势力范围上的争夺纠缠在一起的，因而中国、俄国、欧美列强的各种利益关系就被紧紧地绑到了一起，涉及的问题也特别广泛，其范围不仅包括事件的主要舞台圣彼得堡和北京、伊尔库茨克和库伦，也有广袤的西伯利亚和蒙古、中俄两国由西到东绵延万里的漫长国境、遥远的俄国美

洲殖民地，还有俄国和英国展开激烈争夺的中亚、以俄国为首的神圣同盟与拿破仑法国展开斗争的欧洲……这次外交行动还牵扯到耶稣会士在世界许多地方的活动，牵扯到俄土战争，牵扯到西藏、印度、喀布尔、缅甸、越南、波斯等地区和国家。大量第一手资料对俄国经济和全俄市场的发展，西伯利亚的开发、交通、城市发展状况，恰克图贸易的规模、格局、运作机制，中国西部地区通过当地民族同境外开展贸易的状况，以及中俄两国政府的外交理念、决策过程、边境管理机制、外贸管理机制等等都有详细的描述和说明。相信本文件集出版后，必将引起研究者和一般读者的浓厚兴趣。

在翻译本卷的过程中，也发现编者有一些看法是我们难以苟同的，需要提出来说一说。

编者在前言（《尤·亚·戈洛夫金出使中国之行》，索引中简称为编者前言）中认为，根据《尼布楚条约》划定的中俄东段边界，是“中国对俄国欠下的债务”。这一断语无形中否定了该条约作为平等条约的性质，显然有违于历史事实。1689 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之间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它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中俄两国领土管辖状况、对边界情况的了解和国际法准则，为两国缔造了较长时期的边界和平和睦友好关系，并为当时的沙皇政府所接受，称之为“和平条约”。该条约的平等性质，不仅为当时的沙皇政府和清朝政府双方共同确认，而且也得到沙皇时代和苏联时代的许多俄国学者确认。本文集所收入的一些俄国官方文件，也反映了上述这种俄国对条约的较为一贯的看法。而所谓“欠债”，只是俄国学者中的一种观点，而且长期以来并不是俄国的主流观点。只是到了 20 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以后，由于受到两国意识形态之争的影响，苏联政府才改变了对事实的认定，把《尼布楚条约》看成是不平等条约。今天，当

中俄东段边界问题已经彻底解决、整个中俄边界重新成为联结中俄人民世代友好的纽带时，这种“欠债”的观点也该是回归历史事实的时候了。

还有一点应当指出的是，编者的注释中，有一些资料来自俄国在华教士们的道听途说，对中国的许多情况、特别是对清政府典章制度的阐述有许多错讹之处，译者不能一一指出。在此要提醒读者，使用这些资料时务必查对有关中文资料，以免以讹传讹。

戈洛夫金使团的派出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政府对华政策的集中体现，因此使团受到其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对清朝政府而言，该使团来华却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意义，以致在嘉庆朝的《清实录》中竟然没有相关记载。这一方面反映了闭关锁国政策在嘉庆朝的严重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的麻木不仁。仅就此而言，这部文献资料对清史研究的意义就很值得重视了。中俄关系是清代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俄关系，不仅要研究中国一方的对俄国的政策，还必须研究俄国的对华政策和相关国家在对华政策中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从目前我国学者对中俄关系的研究来看，窃以为对 17 世纪下半叶和 19 世纪下半叶的研究比较深入，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对 19 世纪上半叶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特别是对 19 世纪初俄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在我国基本还是空白。这种研究工作中的不连贯性，就使我们难以准确和深入地把握俄国对华政策的本质和特点。这部文件集恰好为研究 19 世纪初俄国对清帝国的政策提供了无以替代的基础资料。

* * *

前面已经提到，这部文献资料集内容特别广泛，涉及许多国家的大量历史、地理、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

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知识，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书中相当数量来自蒙古突厥和满通古斯民族、特定地区、特定行业、特定历史时期乃至中国方言的词语，是目前现有各种辞书所难于应付的。许多地点、机构、人物、事件的译名，有赖于做艰苦的查对工作或重新予以创立。原档案文献中文字上的晦涩或讹误，要求在译文中得到恰当的处理。档案文献所涉及的各种事件，从孟加拉、柬埔寨到鄂霍茨克海、库页岛，从里斯本的宫廷到玉兹汗的金帐，从奥斯特里茨的战场到马卡里耶夫集市，其中许多富有特色的文字表述，形成了原原本本翻译传达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暗礁。许多中国文献，本来是应该查对存放于北京、乌兰巴托、圣彼得堡、莫斯科各档案馆的原件的，但囿于条件和时间，只好满足于从俄文照译，无法进一步去做文本核对工作。文献中有些中下级官员、军官士兵、普通居民的名字，以及小居民点、街道、小山丘、小溪流的名字，由于无从查考，只能满足于音译。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俄语，正处于古俄语向现代俄语演变的最后阶段，许多基础语法范畴和语法现象仍处于不稳定之中，也构成了使用者的随意性，表达上不规范性，从而增加了理解的困惑和翻译的难度。

值得告慰的是以上种种困难并没有成为我们降低工作要求的借口，反而成为我们提高工作质量的动力。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的同志们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提供了各种可能给予的协助。特别是著名的中俄关系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薛衔天研究员应邀为本卷的翻译担任审校工作，对照原文认真审读全书译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本书责任编辑柏峰同志在编辑过程中认真核对与广东地区相关的档案资料，订正了相关的译名。所有这些，都为提高译文质量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谨向他们表示

诚挚的谢意。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力图信守忠实原文的原则，力争准确传达文献资料的原貌。原编者所有对文本的技术性处理，如脚注、尾注、文本中的附加符号（着重号、增补文字的括号）以及不同字体的运用等等，务求与俄文版基本保持一致。对俄编者明显的疏漏和错误，我们则通过脚注予以订正，并注明该脚注出自中译者。俄文文本中所标的原档案页码，我们在译文中以双斜线（// //）前后区隔，照样标出，以供引用者标注出处时参照。俄中对照人名、地名索引按俄文字母顺序排出。

虽然我们始终本着老老实实、认认真真的态度，为保证工作质量不敢有所松懈，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对得起读者，对得起编者，对得起自己，但学无止境，加之篇幅浩大，精力有限，错误和疏漏恐怕还是难免。译者们怀着诚惶诚恐之心，敬候指教。如蒙赐告，不胜感激。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各位同人，其个人情况和各自承担的章节如下：

徐昌翰（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古文献学引言》、1—59 号、177—204 号、213—252 号、298—318 号 360—396 号文件；

宋嗣喜（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译审）：《尤·亚·戈洛夫金出使中国之行》、60—176 号、319—359 号文件、全部附录；

宿丰林（莫斯科大学博士、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05—212 号文件；

刘润南（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253—297 号文件；

阿拉腾·奥其尔（中国人民大学博士）：397—482 号文

件；

徐明稼（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副博士生）：483—536号文件。

除宋嗣喜、宿丰林所译文件的部分尾注由他们本人翻译之外，其余所有文件的尾注均由徐昌翰译出。

全书译文由徐昌翰统稿、订正，由徐昌翰、薛衍天审校。

又，徐明稼为全稿作了编排上的计算机处理、整理目录、校对人名地名、为全书插标原档案页码；四川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02年级的全体学生参与了奥其尔所承担文件的部分翻译工作；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杨昕沫参与了戈洛夫金传记的部分翻译工作，并协助宋嗣喜完成打字工作，特此一并致谢。

徐昌翰

2006年4月9日初稿

2009年5月20日修改

Ю. А. 戈洛夫金 出使中国之行

各国间外交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不少事件，使历史学家久久激动不已。这些关系含有种种解不开的谜，有时往往还打上同时代人截然相反评价的印记。19 世纪头 10 年俄国向清帝国派遣的一个未获成功的使团，便属于这类历史事件。专家们至今仍搞不清楚，究竟应把它视为派往北京的使团，抑或前往库伦（今乌兰巴托）的考察队。使臣 Ю. А. 戈洛夫金伯爵是亚历山大一世皇帝的个人代表，这位外交官的行动完全得到了皇帝的赞同，虽说最终未能通过清帝国的蒙古前哨到达中国。嘉庆皇帝把俄国使团失败的过错全推到俄国使臣身上。还有一位皇帝也同意这种意见，那便是拿破仑。他在回忆录中评价了当时的国际关系并指出，如果俄国使臣确实想完成自己的使命，那他就应该服从接待他的国家所规定的外交礼节^[1]。

许多年来，使团失败的原因被解释为俄方不愿服从中国的“叩头”仪式，因而使团成员才被逐出清帝国。俄国和西欧各国在不同时期派过好几个使团前往清帝国，它们都曾有过不少类似的或几乎类似的经历，这就为这种既简单又明了的解释，做出了有力的佐证。只要想想俄国使臣 Ф. И. 巴伊科夫（1655）或不列颠外交官阿美士德（1816），整个情景似乎便呈现在眼前了。然而在那几个世纪，同样也不乏一些